

September 2017

Personal Experience About Frankfurt School: From "Non-Identity" to "Singularity"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amuel Weber

Yong Zhao

Weber Samuel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o, Yong, and Weber Samuel. 2017. "Personal Experience About Frankfurt School: From "Non-Identity" to "Singularity"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amuel Webe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40-4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非同一”到“独异”

——塞缪尔·韦伯访谈录^①

赵 勇 塞缪尔·韦伯

摘 要：通过这一访谈，塞缪尔·韦伯生动地回顾了1960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的经历，呈现了阿多诺思想中目的论倾向和“非同一”观念交织的特征。结合阿多诺的真实处境和“非同一”思想的局限，访谈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行动规划之间难以逾越的间隙。在“非同一”观念的基础上，韦伯汲取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重复”“独异”这些聚焦于具体事物的观念。访谈还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引出了“异域词语”问题和阿多诺的身份问题。此外，韦伯从词源和义理的角度出发为汉语译介“Essay”提供了参考，并风趣地评点了阿多诺的爵士乐批判和鲍伯·迪伦的获奖。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非同一；独异

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员。电子邮箱：bnuzhaoyong@163.com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荣获美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高级别“阿瓦隆基金”头衔教授，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该校驻法国巴黎批判理论项目主任。电子邮箱：s-weber@northwestern.edu 本文系北师大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文本与潜文本：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项目编号：SKZZY201507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Personal Experience about the Frankfurt School: From “Non-identity” to “Singularity”—An Interview with Samuel Weber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Samuel Weber vividly reviews his personal study experience with Adorno in the 1960s, revealing some features of Adorno's thoughts such as the teleological tendency and non-identity. Based on Adorno'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limits of his general concept, Professor Weber and the interviewer discuss the inevitable barrier between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action plans. He further develops “repetition” and “singularity” from Kierkegaard, Walter Benjamin and Derrida, which focus on the concrete things. The interview also reveals the question of foreign words and Adorno's half Jewish identity in the discussion of Adorno's controversial saying,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Furthermore, Professor Weber gives suggestion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dorno's “Essay” considering its etymology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tion. He also gives witty remarks on Adorno's critique about Jazz, and comments on Bob Dylan receiving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Keywords: Frankfurt School; Adorno; social critical theory; Non-identity; singularity

Authors: Zhao Yong is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 special researcher (Beijing 10086, China). Email: bnuzhaoyong@163.com Samuel Weber is Avalon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Northwestern Paris Program in Critical Theory (Evanston 60208, U. S.). Email: s-weber@northwestern.edu

全文中采访人赵勇的问题简写为“问”，受访人塞缪尔·韦伯的回答简写为“答”。

问：韦伯先生，您是英语世界最先译介阿多诺思想的学者。许多年前，当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受益于您的翻译和研究论文。比如，您曾创造性地

构造了一个新词：Mass mediauras,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刻而有趣的观念，我在撰写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时曾试译为“大众媒光”，回想起来颇受启发。我们的访谈或许可以围绕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从有关阿多诺、本雅明的问题开始。记得您曾追随阿多诺学习过，我对您的这一经历很是好奇。首先，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对阿多诺的思想感兴趣的？

答：1960年，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尔后，我作为交换生去慕尼黑大学呆了两年，主要学习德语。1962年我回到美国，从秋季学期开始进入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跟随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当时他是位有名望的大师，耶鲁也声名卓著。从那时起，我的一切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我对耶鲁非常失望。韦勒克人特别好，颇有雅量。不过从智识上说，他的课程不是那么有趣。他刚刚完成了四卷本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我想现在没有人会去读了。那是特别无趣的现代观念汇编。乏味的原因在于这些观念和各自的语境分离开了，比如黑格尔曰，谢林曰，诸如此类。大体上看，我觉得耶鲁的思想不是那么令人兴奋。不过，那里有一群学生很活跃。其中有一位来自圣保罗的巴西人尤其活跃。他名叫罗巴托·施瓦茨(Robato Schwartz)，仍然健在。他可能在维也纳获得过救助。纳粹在奥地利掌权后，他的父母移民到别的可以生存的地方，就去了圣保罗。他很了解德语传统下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卢卡奇、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向我们介绍了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还有阿多诺、本雅明等。这些信息不是来自老师，而是从相当优秀的研究生同学那儿得到的。

其次，1962年秋的世界大事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恶化。我生于二战后的美国，一直认为美国处事公正，反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等等。从古巴革命开始，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发展到古巴导弹危机。突然间，(美国)变得问题重重。原先确立的政治价值遭受一种危险方式的挑战。古巴导弹危机很可怕，我们看到前苏联的舰艇靠近古巴，美国不得不去阻止他们。这时美苏很可能发起一场战争。所以在这个紧张的局势下，我突然发现了阿多诺的思想。我想指出这个背景很重要，我并不是单纯去图书馆读读书而萌生兴趣的。一方面，那时已有的文学理论太学院化了，切断了和政治、社会问题的联系；另一方面，

社会问题很严峻。因此对我来说，阿多诺的思想是一个重大发现，远远超过卢卡奇对我的吸引力。这源于阿多诺同时致力于文本内在批判和社会批判。那个时期，我边读边译他的《棱镜》文本，我称之为“文化批评和社会”。他在其中论述了什么是“内在批评”(immanent criticism)，换句话说，他以此对抗简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比方说后期卢卡奇思想中的一些东西、斯大林主义的卢卡奇，在那儿一切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因素。阿多诺运用的是内在批判，做的是文学研究。我当时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对其他东西感兴趣，比方说弗洛伊德、各种语言等等。这就是我发现阿多诺思想的契机。

问：您刚才提到了韦勒克，韦勒克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知名度很高，我们这里也译介了不少新批评学派的思想。顺着您的思路，能否谈谈1960年代美国人文学界的情况，这种状况与您亲近阿多诺的思想有关联吗？

答：的确如此。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大讨论，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学派和耶鲁的新批评学派。每派的思想都不算充分，但多少有些道理。那时我也找到了保罗·德曼。德曼和阿多诺无法统而言之。不过，他们都是细读文本的思想家，并且有广阔的视野，远超于学院里那些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批评，后者在当时是主流。这二人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派，也非道德说教派。阿多诺当然不是新批评派，也非亚里士多德派。不过他运用辩证的方法，尝试从里到外地研究美学、诗歌、文学，把它们视为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判，诸如对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等等。似乎突然间能够以精深复杂的方式来思考文学和哲学，并且没有忽略社会问题。对我来说，这很关键。这不是美国当时所用的道德说教方式。那些进行社会批判的学者，像哥伦比亚大学的莱诺·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他的学生斯蒂文·马尔克斯(Steven Marcus)，他们当时是一个学派，总是在基本的道德价值上下功夫，没有联系社会，被当作“元社会的”(meta-social)批评。我不太认同这种方式。比如，当时我看约翰·肯尼迪为美国政府一个政策作辩护，那明显是个殖民政策。那是有关麻油矿物油混合物的政策，为美国的油、糖公司牟利，却用夸张的道德词汇宣扬。约翰·肯尼迪

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我对这种言论已颇为怀疑。那时爆发了猪湾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未遂,接着是刺杀肯尼迪事件、越南战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事情推翻了美国作为公正、规范、美好社会的神话。所以我正好读阿多诺。他到过美国,并对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过批判。这就是我对他感兴趣的缘起。

问:众所周知,阿多诺是很难读懂的,您当时是怎么开始研究阿多诺的呢?

答:我立即就展开了翻译,因为在读德文的时候,反正就在翻译了。为了去理解,不得不翻译。所以我想何不把它译过来?我是从阿多诺的《文学笔记》中关于巴尔扎克的论笔(essay)^②开译的。然而第一句话我就没法下手。德语似乎是“Der Bauer kommt in die Stadt”,^③我用英语译不出Bauer这个词。没有哪个词能对应它。peasant和它不对等,farmer也不一样。farmer是拥有土地的农人。peasant或许还接近一点,peasant暗示不具土地所有权的人。Bauer既不是peasant也不是farmer。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词我就无法下笔。这种体会贯穿到日后我的所有翻译经历。最难的话不是那些理论概念之词,而是那些具体指涉的词,带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意味,有些词美国英语没有对应的东西。这就是我研究阿多诺的初始。对我来说,阅读就是翻译。后来,我把译稿发给马尔库塞。他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沃尔塞姆(Waltham)的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书。那时大约在1964年,他邀请我和他会面。他建议我把译稿寄给阿多诺,听听其意见。阿多诺收到后对此赞许有加,他鼓励我继续翻译。我和我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任妻子)决定翻译阿多诺的《棱镜》。我得说,这本书相比于其他著述容易一些,不过也很难,有许多不是概念而是实指的词汇。

问:那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去德国跟随阿多诺学习的?您对当时的社会研究所是什么样的印象?

答:在康奈尔大学,我遇到了保罗·德曼。他当时在上一门研究生的课程,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无疑非常精彩,并促使我去了解海德格尔。那时《存在与时间》刚刚被译成英文。接着我告诉德曼,我对阿多诺的思想很感兴

趣。虽然德曼和阿多诺的研究并不相同,但是他给了我三年的奖学金,前两年在康奈尔,最后一年去法兰克福和阿多诺学习。后来就自然而然发生了那些事。我在耶鲁只呆了一年。这令人有些尴尬,因为韦勒克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要不要再给我一些奖学金?我说,不,这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我无话可说,他那么好,我总不能说不在那里很无趣。我忘记了怎么说的,不过总有些理由吧。所以,自1964年起我在康奈尔两年,1965年到1966年在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跟阿多诺学习的时候,我享受优待。你想我远道而来,是第一个译者,阿多诺给我的译书写了序言,评价很高云云。他那时还不是那么有名,人们对他的译介也不太多。我在那里比较特殊,因为我不是依赖于他的门生,他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也没有过博士生导师,那是个名称而已。德曼只是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他像是那种讽刺话所谓的放任的父亲,说你尽管去,写了寄给我看就行。他人特别好。他知道我对阿多诺的思想很感兴趣,不过他感觉热情总会消退的,哈哈。年轻人痴迷一些事物,但总会消退。我当时不明白,但德曼清楚,没人会痴迷什么人物超过一年。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我在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学文学的博士,不是哲学,也不是社会学,但阿多诺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另外,我的家人当时加入美国犹太团体,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此我和霍克海默有了来往。1965年,霍克海默已经退休,他每年会在法兰克福呆一个月,参与阿多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研讨班,以此跟他保持联系,不是完全离开。霍克海默住在瑞士。他是哲学家,也是商人,所以和美国犹太团体有往来。我和他见面时谈论纽约、美国人,很少谈论哲学问题。霍克海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那是相比于德国人,美国人比较越礼的故事。他说他夫人有糖尿病,从前他们住在纽约,夫人时常得注射胰岛素。一个礼拜天晚上,他们没有胰岛素了,就去药店买。不过,买胰岛素需要有医生的处方,他们没有。药店的人就问,你们有doctor(医生)的处方吗?霍克海默壮起声势说,没有,不过我自己就是一个doctor(博士)。那人接着回答,噢,不过,那你是什么的doctor(博士)?霍克海默特别喜爱这个故事,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弄到胰岛素。这就是美国人的越礼之处,对德国

人来说,doctor(博士)很有权威。我和霍克海默就是这样交往的,亲切但无关学术,会会面喝杯咖啡而已。

问：您提到的生活中的霍克海默很有意思,印证了我在阅读研究时的感觉。那么生活中的阿多诺又是什么样呢?读阿多诺的著作,觉得他的论证绵密紧实也诘屈聱牙,他讲课时也这样吗?那个时候学生运动应该开始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是从事社会批判的学者,却逐渐走到了学生的对立面,因此也与学生产生了种种冲突。在您看来,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如此选择而不去支持学生的革命事业?

答：那时研讨班的氛围非常沉闷,所有年轻学生对教授都言听计从毕恭毕敬,他们很高兴我能参与进来。我学的两门课难度都很大,阿多诺讲授的内容是《美学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里的,他讲课的方式被德国人称作印刷厂(die Druckerei)。我们没有笔记参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有一个秘书帮着录音,然后记下做些改动就出书了。他说的句子都很长很长,并且不带稿子,就像他写的那样毫无纰漏,令人惊叹。两门课后来结集出版成《美学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这两本重要著作在那个时候就完成了。的确如此,那时学生运动开始了。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和学生们之间有许多冲突。学生运动不是文化大革命,然而有点朝那个方向发展的意思。批判理论的理念很好,但是问题在于怎么去改变社会。你得注意德国那时处在过渡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年一代都是纳粹时期长大的,1960年代中期他们在社会上有了权势名望,像政客、教授这些人就是如此。他们并不愿意破坏现状,而是想维持平衡。总是觉得这儿有点过分,那儿有点过激。与此同时,他们这代人对美国很恭顺,美国不仅是二战的受害者,还是民主自由的代表。青年一代可不这样想,越战让他们觉得美国是殖民主义,被宠坏的国家。所以年轻人和高级教授之间有很强烈的冲突。阿多诺处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他在启发学生,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卷入这些实际冲突。我在那儿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德国人用一些筒柱贴海报、宣传页、广告。一天早上,那上面贴了一张巨幅的阿多诺照片,红色的边框,上面用德语写着:“是时候了,同志!现在是时候夺取权力了!——特奥多尔·阿多诺教授”。阿

多诺知道后又愤怒又害怕,他马上拟了一个法律投诉声明,与此撇清关系。这个事件本身属于慕尼黑情境主义运动,是那种无政府式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个运动来自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其中一个领袖叫居伊·德波(Guy Debord),他写过《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他们批判社会,这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相合之处,不过他们的言论激烈欠缺思辨。他们影响了很多,比如利奥塔。到了1968年初,这些人发起了无政府主义革命,从法国扩展到其他国家。不过这回是德国境内慕尼黑的组织,他们的人做了海报来羞辱阿多诺,他确实非常尴尬特别生气。不过,阿多诺和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SDS, Der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的冲突也开始了。这是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青年团体,他们有很多改革意见,非常激进,后来发展到毛主义,对一切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样阿多诺就被夹在中间。因为大家都以他为示范。不过,批判理论是某种激进批判运动的基础,并不能真的指导行动。当时学生开始占领大学,他们也占领了社会研究所。众所周知,阿多诺叫了警察。这是个重大失误,当然后来他非常后悔。他说本应该跟学生们协商和解的。不过这个反应代表了恐慌心理。阿多诺担心被政府和研究机构推翻。从1965年起,这些冲突开始激化起来。

问：您这番讲述非常生动。我了解到因为阿多诺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讥之为“口头革命派”,能否这样评价他的批判理论?

答：可以说阿多诺自己沉迷于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而他的学生社会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想从他那儿得到改变社会的具体方法。这样就有冲突。有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一些女士走上台脱掉衣服羞辱他。^④那个时候,阿多诺已开始构建起一套强大的批判,反对从荷马到现代的西方自恋思想,就是批判西方思想没能为他者腾出地方来。不过阿多诺本人就很自恋。他常常交往有权势的女友。那人很漂亮,是个有权势的律师,坐在那儿听他的讲座,诸如此类。有时我也对这些矛盾之处感同身受。教授们生活优越,然后告诉学生们这个社会不公平,但他们自己却是受益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这就很分裂。以我的处境为例,美国西北大学的本科生是要花一大笔钱交学费的。不过,阿多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因为学生们

都关注着他,以求解决之道。我自己的感受是,阿多诺不仅没法给出一种政治行动规划,这在当时自然是很难的;而且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很抽象。他发展出来的思想范畴像非概念化、非同一,这些都是相当泛化的。你必然要对具体事物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太宽泛就无法抵达这些具体层面,有必然性却并不充分。对我而言,他在具体问题过于蜻蜓点水。

这是我后来对本雅明和德里达感兴趣的原因,我找到了一种聚焦于具体事物的方式,主要是以能指的方式对语言提出质疑,这其实就在阿多诺宽泛的非概念、非同一的思想范畴里。所以我对本雅明、德里达,还有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研究,一以贯之地延续了阿多诺的思想,并非分道扬镳,这里面并不矛盾。我所谓的独异(singularity)^⑤正是非概念、非同一范畴和具体情境的结合。但是事物总是变化的,(独异)也不是确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涉及独异问题的时候,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改变了书写的方式,也改变了语言的功能等等。我在法兰克福参与阿多诺研讨班的时候,曾递交过关于隐喻的论文。在其中,我论述隐喻问题不可消除其语境因素。他的学生们听后火冒三丈,但阿多诺为我辩护,非常和善。因为他对音乐感兴趣,这也在同一个方向上。不过,我发现阿多诺思想暧昧不明的地方,在于他那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概念有目的论倾向。阿多诺运用的一个德语词突显了这个问题。当他探讨音乐的内在发展的时候,他用形式的规律来批判庸俗的还原主义。但这是一种理想化,我并不认为有那种规律或形式。比如,在他的音乐理论中,他很早就说斯特拉文斯基很糟糕,勋伯格很棒,但他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东欧文化那些最没有西方特点的音乐,因为他还是带着黑格尔式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走向一种总体(totality)。当然他也批判这一总体的概念。他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说,总体并不是板上钉钉的那种东西。

问:是否可以说阿多诺思想的摇摆可疑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有黑格尔式的目的论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概念化、非同一的?

答:这样说有点大而抽象,他可能会同意,但他还是会避免这样去说。比方说,德里达的术语iterability(可重复、可复述)也比较宽泛,但他说这

不是一个概念,其中有些事物不得不完结掉,我想他是说 iterability 联结着这个概念和非概念化的具体之物。我研究并写过“重复”(repetition)这一思想。阿多诺和本雅明很大一个分歧在于,阿多诺由于某些原因只取重复里“同一”这个意义,并认为它不是辩证的,但这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重复。我记得他写道,“克尔凯郭尔一书论述重复的地方很有趣,但是我要是朝他那个方向走,就偏离了自己的规划”。这样,他批判克尔凯郭尔是一种内在主义。

对我来说,重复是一个重要的非同一的范畴,它带来了一些游戏、变易、运动,从普遍走向独异。霍克海默有一位杰出的学生,叫 Karl-Heinz Haag,他曾是耶稣会信徒,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他为阿多诺的纪念文集写过一篇文章,名为“Das Unwiederholbare”,意思就是“不可重复的”。我曾写过这一学派不理解“不可重复的就是可重复的”。换句话说,独异是不可重复的,同时只有重复的方式才产生独异。重复不仅仅是阿多诺所批判的大量生产,对此本雅明也提到过。我曾引用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话,重复和独一无二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一点我没见过阿多诺有什么理解。

不过,说到阿多诺和黑格尔,可以从他们对康德的理解来看出些分歧。阿多诺曾经让他的学生不要像黑格尔那样简单地看待康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论里嘲讽地批判康德不懂得辩证云云。那时候阿多诺的学生们都推重黑格尔,但是阿多诺说康德是思考非同一的重要哲学家,他曾为此写过一章。所以他并不只是黑格尔式的,也有康德这一面。

问:说到康德,本雅明的思想是不是与他更紧密一些?

答:我想是这样。说到本雅明和康德的联系,我写过一本书。在本雅明早年的《即将来临的哲学之纲要》(“Über das Programm der kommenden Philosophie”)中,他从经验这个观念重新思考过康德。康德认为本体和现象之间、普遍和理性、物自体和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区别。经验在他看来比认知更广,并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观念。但是本雅明认为不是这样的,得从有限和独异来考虑经验。彼得·芬沃思(Peter Fenves)教授做了许多研究来具体阐述本雅明和

他的老师亨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之间的联系。李凯尔特很有趣,阿甘本采用的**bloßes Leben**(纯粹的生命)就来自他,本雅明的《暴力批判》也写过这个观念。李凯尔特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过批判。阿多诺和本雅明都曾师从于他。他是新康德主义者,还是马堡大学的教授,教过海德格尔。**bloßes Leben**就来自他对柏格森富于同情的批判而来,叫《生命哲学——吾时代哲学潮流的表现和批判》(*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Modeströmungen unserer Zeit*)。本雅明很清楚把认识论批判延伸到基于有限之物的批判是复杂的问题,这和海德格尔有些类似。年轻的本雅明和年轻的海德格尔有很多相似之处,像从独异、有限、存在来重新思考生命,尽管两人的观念并不相同。这个问题也打开了本雅明关于语言意指的思考,这里我在说北师大讲座上的一些论点。本雅明和海德格尔在那时都准备写关于意指形态的教授资格论文,本雅明对知识的观念批判得更多,这一面和康德有关,更加强了他的批判。这也涉及本雅明的一切价值取向,比如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诗人,而不仅仅是有欠缺的哲学家,什么是诗人可以做到而哲学家却是难以企及的。

问:您曾写过研究本雅明的专著 *Benjamin's abilities*,从您这次来北师大的演讲中,也能感觉到您对本雅明的说法多有借用。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您怎样评价阿多诺与本雅明的思想异同?从您自身的研究特别是“独异”观念来看,您是否更倾向于本雅明的思想?

答:我认为阿多诺是很重要的,他设立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换句话说,当我提出从圣经到新旧约、笛卡尔等有一种延续,我称之为一种认同范式,这更接近阿多诺在《辩证看启蒙》中的态度。但是说到实际研究文本,本雅明可能更重要些。我有一段时期很难认同本雅明的弥赛亚批判观念,我不相信事物可以被拯救,或者说应该被拯救。另一方面,本雅明论悲苦剧的书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我从中读到了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还有戏剧、语言,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只是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不接受,把寓言当成一种拯救的象征。我认为最后一页他撤退到一种辩证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问: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经思考过阿多

诺和本雅明之争,当时我主要是在他们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分歧方面思考问题做文章。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答:阿多诺和本雅明之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很难纯粹在知识层面谈论,因为阿多诺在纽约生活无忧,而本雅明却为基本的生存挣扎,他更接近政治危难。他们频繁通信。阿多诺担心本雅明关于19世纪观念摇身变为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但我觉得问题并不在那儿,在于本雅明的弥赛亚观念。本雅明试图建立一种弥赛亚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是问题所在。因为如果你试图去拯救的话,就悖离了非同一的冲动。本雅明的理论总有一种拯救事物的倾向。比如说到“起源”,会有还原某些事物的努力。他说那些事物辩证地运行,直到展现出历史总体。所以本雅明仍然有总体的观念,他不够彻底地康德化。因为康德说你只是运用理性去认识,你并不能知道总体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多诺吸取了黑格尔 *Versöhnung*(融合)这一观念,这也是基督教的观念。这是阿多诺特别关键的词,就是两个相反的事物融合,但不是有意地去统一它们。最近上课时我谈到德勒兹的间距,它决定了两个相异事物的联系,他谈到天主教电影,特别是布列松。德勒兹从天主教意义讨论电影,打开了融合问题的宗教维度。但是阿多诺不认为融合是宗教上的。所以回到你的上一个问题,我想我的研究是结合了本雅明和阿多诺两个人的思想。

问:说到关于艺术上融合的问题,我倒想到阿多诺一个颇为矛盾的观点。那是《棱镜》中的第一篇文章“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这篇文章的最后有阿多诺的一句名言: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这句话曾引起许多争论或者说误解。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⑥,是想贴近阿多诺的相关解释与回应,把这一命题看作阿多诺提出的一个有关“二律背反”的理论难题。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句名言的?

答:阿多诺这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有两个原因。首先,barbaric(野蛮的)是针对不会讲本国语言的外国人,希腊人叫那些异国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只能听到别人巴巴巴的说话声。因而没有哪个词比它更野蛮了。阿多诺应该意识到这个

问题。如今依然,比如法国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叫作野蛮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互相称作野蛮人,人们把他者当作野蛮人等等。重要的是严肃对待词的意思,野蛮这个词是取消他者的话语意义,当成不可理喻的东西。一切因之遭受损害。当然我了解阿多诺的用心,诗歌所建构的民族性、暴力的缺席在奥斯维辛之后变得苍白。不过,“奥斯维辛之后”指的是时间上的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这句话的含混使其广为人知,也或许不受待见。它把议题极大地简单化了,并不能鼓励人去思考,这就不对了。阿多诺在《异域词语》(“Wörter aus der Fremde”)这篇小文里谈过他在学校说外国词汇而被嘲笑的经历,因而尝试论述异国词语的重要意义。他应该意识到 barbaric 本身有取消他者的这层意思,而不是以否定的姿态拿了就用。这句话有很多可说。这里的诗歌本身指的是抒情诗(die Lyrik)。抒情诗传统更多自我中心的意味。所以这句话就是不应该在奥斯维辛之后写那些抒发自我的诗。但这样说是很愚蠢的,自我持续存在着,重要的是取决于怎么去写诗,所以就会谈到策兰。策兰的诗是很成问题的,我并不是他的毫无异议的倾慕者。他的诗也有些自我沉溺,我不是特别喜欢。不得不说,这句话即使是否定的意味,引起广泛的议论本身就很有意义。基于某种艺术的观念,阿多诺此言确实带着一定的阶层偏见,虽然他从不认为如此。比如阿多诺写过贝克特,那时贝克特写诗。照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在奥斯维辛之后讨论贝克特的诗吗?贝克特就是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反思,跟策兰一样。阿多诺青睐贝克特,所以问题可能在于德语词 Lyrik。在阿多诺写作时,一位法国学者, Hugo Friedrich 写了现代抒情诗的教材,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当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多诺的出身问题也显露出来了。纳粹占领德国的时候,阿多诺已经离开了,他只待到 1934 年。他写过一篇文章,被一位名叫 Balthur von Schirach 的人收入纳粹文集,我想此人被希特勒重用过。阿多诺可能用的是别名写了关于民歌的东西,并不是纳粹的宣传,但仍然是件可怕的丑闻。^⑦阿多诺认为自己是牺牲品,像当时海德格尔是特别罪恶的人,诸如此类。也许阿多诺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特别内疚。他有一半犹太血统,其父是犹太商人,他取了他母亲

的姓。很长时间他的名字是 Theodor Wiesengrund,姓的意思是草地。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一书中阿多诺是一个角色的原型,有个人在用钢琴弹奏“Wiesengrund”,这个描写要弄了一下阿多诺。可以说,阿多诺以这个方式拒绝了父亲的犹太背景。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对此进行精神分析。我想他意识到这有些恶劣,任何幸存下来的人都该感到内疚,为什么我活下来了而别人被杀害了。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有一半犹太血统,但是想要适应新的统治秩序,这跟德曼有一点点类似,但那是另一桩事了。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人发现了 Balthur von Schirach 的杂志,这件事就公之于众了。阿多诺感到非常尴尬。

问:您从 barbaric 引入“异域词语”问题,这令人耳目一新。我接着就要请教一个异国词语的问题。阿多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Der Essay als Form”,但 Essay 译成汉语很不容易。目前汉语中对译 Essay 的有“随笔”“散文”和“论说文”等,但我觉得都不理想。在阿多诺谈论的语境中,或者参照阿多诺的写作风格,您是怎样理解 Essay 这种文体的?您的理解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个更恰当的汉译。

答:我很久没读这篇文章了,需要回头再琢磨一下。不过,我想这些翻译都不准确。阿多诺会说 Essay 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体。英语和德语中,Essay 源初的意思是尝试(der Versuch),古英语写作 assay,意思也是试验。不是已完成的,只是试验的。比方说,我记得克尔凯郭尔的《重复》在丹麦语里用了尝试一词。这个词可以译作试验,听起来是科学实验,但与此无关。所以 Essay 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漫的。阿多诺不会接受“散文”,他希望一切都被紧密地论述。而“论说”也不对,问题在于你先存了观念来论证它,暗示着有既成的观点。Essay 更像一种探索,就是试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关键在于认识是牢固的、确定的,还是相对的、试验的。

问:最后请您谈谈当下的一个现象。前几天,刚刚公布鲍伯·迪伦(Bob Dylan)获得了新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多诺是流行音乐、爵士乐的批判者,他对摇滚乐应该也没什么好感。如果阿多诺在世,您觉得他会如何评论鲍伯·迪伦的这次获奖?

答：我想这是两件事。我认为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批判有意思，但的确过于简化。实际上，我做研究生时和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讨论过此事。这人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原先在奥地利。他叫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任教于伦敦大学声誉卓著的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近年刚去世。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视野撰写了现代欧洲的发展进程，学识极其渊博，非常令人敬仰。那人抽一支烟斗，穿一身英式长袍，是奥地利长大的犹太人。他曾化名 Francis Newton 在 *New Statesman* 杂志上发表评论爵士乐的文章。他在奥地利长大所以懂德语，认识阿多诺，能读他论爵士乐的原文，当时英国人都还做不到。我曾有一次午饭时碰到他。他说，你翻译阿多诺这非常好，但是他对爵士乐一无所知。我得说当我重读《棱镜》的时候，我认为其中有些论断是正确的，当然也实在是太过简单化了。有些地方也有道理，比如他对爵士高音的低俗作心理分析。阿多诺应该认同爵士乐，因为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是他寻求的东西。这还是因为他不懂得“重复”(对非同一的)生产力这一方面。

谈到鲍伯·迪伦，我认为这太荒谬了。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很荒唐。你浏览一下当年授予和没被授予的作家，有些人本身很了不起却没有得奖。我非常欣赏迪伦，特别是他早年的音乐，但我不认为那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歌曲作者。我觉得这不公正，不过这就是他们的传统，授予差劲奖。我是这么想的。然而这与爵士乐无关，我爱爵士乐。

注释[Notes]

① 访谈时间：2016年10月17日。

访谈地点：北京瑞草轩茶馆。

翻译与整理：李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和美国西北大学德语系(2014—2016年在美学习)联合培养的博士候选人。

② 后面将会请教韦伯教授有关德语 Essay 一词的翻译问题，Essay 这里试译为“论笔”。以后有机会笔者将会撰文说明如此译的原因。

③ 韦伯教授的记忆与原文稍有出入，原文的语序是“Kommt der Bauer in die Stadt[…]”。参见 Theodor W. Adorno, “Balzac-Lektüre”, *Noten zur Literatur*,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 139.

④ 这次事件发生在1969年4月22日的一次讲座上。当时有人在黑板上写标语(“If Adorno is left in peace, capitalism will never cease”),有人在教室里散传单(“Adorno as an institution is dead”),而三名女学生则走上讲台，围着阿多诺投掷玫瑰花瓣，表演情色哑剧，并最终袒胸露乳，以示羞辱。阿多诺狼狈不堪，挥着公文包抵挡一阵，抓起帽子和外衣落荒而走。参见 Stefan Müller-Doohm. *Adorno: A Biography*.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 475. 亦参见 Lorenz Jäger. *Ado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rans. Stewart Spenc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7–208.

⑤ “独异”(Singularity)是韦伯教授近期著述中阐发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他在北师大演讲的一个主题。2016年10月，韦伯教授应笔者之邀来北师大做了三次主题演讲，题目分别是《文学认知的独异导论，兼致中国听众》《一神认同范式，或独异曾如何被个体概念同化》和《政治和独异，或思索和感觉的军事化》。其演讲稿现已被译成中文，题目略有改动，即将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文化与诗学》上。

⑥ 此文已收入笔者的一本书中。参见拙著《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9—151页。

⑦ 孙传钊在《阿多诺的“硬伤”》(《博览群书》2005年第5期第74—76页)一文中介绍说：阿多诺曾在纳粹“全国青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1934年6月号)上刊登过音乐评论。此文盛赞门采尔(Herbert Müntzel)为希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Die Fahne der Verfolgten”)所谱的曲，而《被压迫者的旗帜》诗集则是“献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这应该就是韦伯教授所谓的“丑闻”。

(责任编辑：王嘉军)